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第二代新儒家的 儒学诠释与创新

【以成中英、杜维明、刘述先、蔡仁厚为例】

「第三代新儒家」意指20世纪70年代以来第二代新儒家学者。他们在总体方向上承接了第一代、第二代新儒家诸先生的思想旨趣，继续以阐扬、发挥儒学为己任，又积极参与中西文明对话和文化重建，使儒学在当代时期呈现出了新的特点。本书以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蔡仁厚为例，对第三代新儒家在理论建构的儒学诠释与创新进行深入探讨。

DISANDAI XINRUJIA DE

奚刘琴◎著

RUXUE QUANSHI YU CHUANGXI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二代新儒家的 儒学诠释与创新

【以成中英、杜维明、刘述先、蔡仁厚为例】

DISANDAI XINRUJIA DE

奚刘琴◎著

RUXUE QUANSHI YU CHUANGXI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第三代新儒家的儒学诠释与创新:以成中英、杜维明、刘述先、蔡仁厚为例/奚刘琴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7-5161-0912-0

I. ①第… II. ①奚… III. ①新儒家—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B261.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98339 号

第三代新儒家的儒学诠释与创新 奚刘琴著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喻苗

责任校对 王雪梅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技术编辑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电话 010-84029451 (编辑) 64058741 (宣传) 64070619 (网站)
010-64030272 (批发) 64046282 (团购) 84029450 (零售)

网址 <http://www.ca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22.25 插页 2

字数 365 千字

定价 6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一个美好的开始

长期以来，海内外学界的新儒家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第一代与第二代新儒家的观点的阐述，诸如对熊十力、梁漱溟、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的表彰与发挥。我最近注意到，有大陆学者开拓了对方东美先生的研究。事实上，方东美先生是新儒学发展的重要人物，因为只有在方东美先生的著作中才能看到一个比较完整的古今中西文化对照的宏观架构，凸显了儒家哲学重要的哲学与历史地位。在此点上，唐君毅无疑接受了方东美的影响。至于学术界对于第三代新儒家的研究文献，近十年来还是比较少见的，而专门以第三代新儒家为研究对象的博士论文更是没有，有之，则自奚刘琴始。因此，能够看到这样一本以新儒家第三代为主题的研究专著，心中感到亲切与高兴。

这本书重要的价值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作者对于第三代新儒家进行了相当广泛和深刻的理解、分析和评价。在尽力掌握第三代新儒家文献资料的基础之上，分析了他们的思想，并对他们进行了专论、比较和总结。本书尤其彰显了作为新儒学发展阶段的第三代新儒家重要的内涵以及他们与前代新儒家的关联与区别。但对他们思想内在的结构与他们之间的学术关系与比较，虽在此书中未能得到完全的解说，却已或多或少地作为问题呈现出来。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提出了一个粗具规模的解析方式。

其次，作者对于四位新儒学代表者的选择值得一提。作者所选择的四位学者，正是新儒学在现时代发展的代表人物。作者在一定程度上还注意到四位代表者的学思历程对其思想发展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他们均有亲炙于第二代新儒家学者的经历。因之，他们的思想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台港

的第二代新儒家的影响。另一方面，第三代新儒家又具有了与第二代新儒家不同的发展方向。本书所选的四位学者，除了蔡仁厚外，其他三位都有长期留学并执教于海外、代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进行沟通与对话的经历，反映出此一时代的特色。蔡仁厚虽然缺少了相似的经历，表现为一种传承宋明儒学的保守心态，但这一点也可以说是此一时代另一面的写真。当然，作者还可以进一步探讨，四位学者思想上与方法上的重大分野，以及形成相异的深层原因。毕竟我们要认识到：对历史文化的研究与对纯粹哲学的创思有性质与视野的差异；对当代多元文化的比较探索与对古代传统儒学的重新了解，也有层次与目的上的区分。当然，我想这本书最终的目的是要说明，第三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基于他们的学术背景，各自作出了他们的贡献，因此也彰显了新儒学的基本内涵。但应该另行指出的是：本书只是反映了时下对第三代新儒家的认知问题或其先后发展问题的一个未经检验的看法，其中并没有谁是领军者的问题，而只有谁在哪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的问题。刘述先教授在其著作中已清晰地说明第三代新儒家的历史统绪应为余英时、刘述先、成中英、杜维明。本书可能把余英时看做历史学家，未加考虑，而以蔡仁厚补充之，是否确当还可以研究，但至少可说是一特色。

再次，作者从儒学宗教性、心性论、道德哲学以及知识论四个方向来考虑现代儒学的内涵，既凸显了儒学本身的丰富性，也凸显了第三代新儒家关注的重点。我很高兴看到的是作者注意到了我作为第三代新儒家对于儒家知识论的深度重视与积极发展，并对此表示认同。事实上，儒学想要获得与注重知识理性与科学技术的西方文化平等的对话地位，必须在此方面持续着力。作者也注意到了我的思想当中强调知识与价值互基与互动的理论特点，可以说把握到了我在此领域中的重要贡献与主要精神，以及为新儒学提出的一个必须发展的方向。我对此持赞赏的态度。但我仍要指出的是：作者应可开发或加强一项对本体论哲学或者本体宇宙哲学的关注。第一代新儒家，以熊十力为例，十分重视《易》学，注重对宇宙论或本体论的思考；第二代新儒家，则普遍重视道德哲学、历史哲学，或者文化哲学，尽管牟宗三早期对宇宙论或本体论有所关注，但后来却转向了道德哲学与道德形而上学；而第三代新儒家，显然大多重视道德哲学、心性哲学与文化哲学问题。然而就我的体系而言，应是十分突出了对宇宙论和本体

学的关注与发挥，并基于易学转化为认知论与诠释学的探索，与儒学的根本性的问题相呼应。

最后，作者还重点分析了第三代新儒家重视传统儒学的现代转化、重视中西文化会通与儒学世界化的问题。作者在这两个方面的关注，既是第三代新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又充分体现了第三代新儒家与前代新儒家的重要区别。虽然在许多方面这两个问题还可以进行更多的说明，也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但是不可否认，本书所做的相关研究是一个很好的开端。

去年暑期我认识了执教于淮阴师范学院的奚刘琴博士。奚刘琴给我一种治学认真、谦虚谨慎的深刻印象。更为难得的是，她还有一份探索真理、追求价值的高度热情。这在现在的青年学者之中是不多见的。假以时日，无疑她会取得更大的成就。她为了等候我的这篇序言，推迟出版计划半年之久，让我非常感动。但这也让我有时间对她的这本书进行了较深入的理解。在我看来，这本书不仅是对于第三代新儒家的回顾与总结，提出了创新的见解，而且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新的问题与探索空间，表达了对未来儒学发展的诚挚展望。是为序。

成中英

序于美国夏威夷大学

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五日

目 录

导言	(1)
一 相关概念的解析	(1)
二 “第三代新儒家”与成中英、杜维明、刘述先、蔡仁厚简介	(7)
第一章 传统儒学研究	(24)
第一节 “内在超越”与儒学的宗教性	(24)
一 成中英:儒学的“终极与整体实在”	(27)
二 杜维明:内在超越与“掘井及泉”	(32)
三 刘述先:内在超越的“两行之理”	(37)
四 蔡仁厚:“摄人文于宗教”的儒学	(42)
第二节 儒家心性之学的阐释与发展	(48)
一 成中英:作为道德哲学之基的儒家心性之学	(49)
二 杜维明:宗教与哲学交汇处的儒家心性之学	(52)
三 刘述先:儒家心性之学的梳理与评价	(58)
四 蔡仁厚:心性学——儒家哲学的根基	(63)
第三节 儒家道德与德性修养	(70)
一 成中英:目的论与责任论相统一的儒家道德	(70)
二 杜维明:仁与修身	(74)
三 刘述先:仁与生生	(79)
四 蔡仁厚:儒家的内圣成德之学	(84)
第四节 儒家认知之学	(88)
一 成中英:道德—知识论	(88)
二 杜维明:“体知”——对儒家德性之知的创造性阐释	(93)

三	刘述先：“良知”与“见闻之知”	(98)
四	蔡仁厚：儒家“摄知于德”与知性之凸显	(101)
第五节	小结	(104)
一	“即儒学即宗教”	(105)
二	心性学地位的肯认与发扬	(107)
三	儒家道德理想的强调	(108)
四	儒学知识论的凸显	(110)
第二章	现代新儒家研究	(113)
第一节	“新儒家”概念与人物的划分	(113)
一	成中英：知识理性与价值理想区分基础上的新儒家	(114)
二	杜维明：儒学的第三期发展与现代新儒家	(118)
三	刘述先：广义的“新儒家”与“三代四群”说	(122)
四	蔡仁厚：新儒家的精神开展与人文关怀	(126)
第二节	当代新儒家人格研究与思想省察	(130)
一	成中英：熊十力、方东美、牟宗三研究	(130)
二	杜维明：熊十力、徐复观、唐君毅研究	(136)
三	刘述先：熊十力、方东美、牟宗三、唐君毅研究	(145)
四	蔡仁厚：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研究	(153)
第三节	现代新儒家的功过得失探讨	(159)
一	成中英：具文化忧患意识的新儒家的贡献及不足	(159)
二	杜维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人文精神之重建	(162)
三	刘述先：新儒家的定位与省察	(167)
四	蔡仁厚：现代新儒家的五大功绩	(171)
第四节	小结	(175)
一	“只识师门，不识门户”——对门户、道统说的反思	(175)
二	当代新儒家人物研究的推进	(178)
三	功过探讨的准确性与客观性	(180)
第三章	传统反思与儒学现代化	(183)
第一节	传统儒学弊端反思	(184)

一	成中英:中国文化的内耗与涣散	(185)
二	杜维明:政治化儒家与五四反思	(189)
三	刘述先:传统文化限制的暴露与儒学的“三分法”	(192)
四	蔡仁厚:儒学的“通盘文化大反省”	(197)
第二节 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		(202)
一	成中英:集“宇宙学、生态学、伦理学”于一体的儒学	(202)
二	杜维明:儒学是“哲学的人学”	(207)
三	刘述先:儒家真精神的现代意义	(211)
四	蔡仁厚:儒学的“八大旨趣”、“四大价值”与“四大 贡献”	(215)
第三节 儒学能否开出民主与科学		(220)
一	成中英:作为西方人权思想根源的儒学与人文 主义的特征	(221)
二	杜维明:儒家传统与启蒙精神的“对接”	(224)
三	刘述先:“曲通”以成民主和科学	(229)
四	蔡仁厚:“良知自我坎陷”的发挥	(233)
第四节 儒学传统的现代转化		(237)
一	成中英:儒学与现代性的整合	(237)
二	杜维明:多元现代性与儒学的转变	(240)
三	刘述先:传统·现代·后现代	(245)
四	蔡仁厚:儒学现代化的“两大纲领”、“三个层次”	(249)
第五节 小结		(252)
一	现代性观照下批判意识的凸显	(252)
二	对当代新儒家“新外王”的扩充	(254)
三	探源与重构:儒学价值的现代调适	(256)
第四章 中西会通与儒学世界化		(259)
第一节 第三代新儒家与西方文化		(260)
一	成中英:西方哲学方法论与本体论研究	(260)
二	杜维明:对西学的吸收与排拒	(265)
三	刘述先:中西比较哲学的开展与文化哲学	(270)

第二节 文明对话	(274)
一 成中英:文明对话与本体诠释学	(275)
二 杜维明:新轴心时代的“文明对话”	(280)
三 刘述先:儒学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对话	(284)
四 蔡仁厚:宗教会通之“六大焦点”	(288)
第三节 儒学世界化的开展	(292)
一 成中英:儒家德性伦理的整体化与儒学世界化	(292)
二 杜维明:“文化中国”与知识分子的责任	(296)
三 刘述先:“理一分殊”与世界伦理	(301)
四 蔡仁厚:中国哲学的普遍性与其世界化	(304)
第四节 小结	(307)
一 融摄西学、多向建树的趋势	(308)
二 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儒学地位确认的转变	(310)
三 充分的对话意识	(311)
第五章 结语	(314)
一 成中英、杜维明、刘述先、蔡仁厚新儒学思想特色	(314)
二 第三代新儒家的学思路向	(320)
三 第三代新儒家的儒学诠释与创新评价	(325)
主要参考文献	(332)
后记	(343)

导 言

一 相关概念的解析

诚如《论语》所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① 解析“儒家”、“新儒家”与“第三代新儒家”，对其作出一般理解、普遍意义的定位与说明，是进行相关研究的必要前提。

（一）“儒家”与“新儒家”

长久以来，“儒”具有多重的意蕴。本文不以专门讨论“儒”为任务，而只界定“儒”的含义。《说文解字》有：“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② 这句话有两层含义。首先，“术士”在古代指掌握各种知识和技能的人。其次，“柔”即谦恭、温顺、平和、宽厚的意思。诚如胡适《说儒》所言：“‘儒’的第一义是一种穿戴古衣冠，外貌表示文弱迂缓的人。”^③ 此处认为儒即“柔之术士”，是以技能、外貌和性格立论；“儒”还指以礼、乐、射、御、书、数为业，通六艺而教民者。所谓“儒者以六艺为法”^④。此是以职业立论；另外，《汉书·艺文志》有载：“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

①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4页。

② 许慎：《说文解字·人部》，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62页。

③ 胡适：《胡适学术文集》，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18页。

④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915页。

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①《淮南子》亦言：“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焉。”^②此是以儒者之学派特征及德性教化之功用立论。综上所述，所谓“儒”者，乃指以继承尧、舜、文、武、周公之道为己任，以孔、孟为师，习六艺、传六经，昌明仁义、尊崇道统，服膺道德理想之读书人。而后世所谓“儒家”与“儒学”、“儒术”、“儒者”、“儒士”等概念或有微小差异，但大体意思与此不差，都是指这样一群具有独特的文化意识和道德理性的知识群体及其学术思想。这样的一个知识群体或文化流派，尽管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表现，但儒之所以为儒的这些基本特征是从一而终的。延续至近现代的中国，则出现了“新儒家”（或谓“新儒学”）之概念。

“新儒家”或“新儒学”迄今为止有两重含义。其一是指宋明理学或宋明道学（New Confucianism）。这种说法始出现于20世纪30年代左右。因有学者认为，儒学在经历了先秦的发展后，至汉为显学。然迤迤至唐代，佛教炽盛，儒家有限的风光被日盛的禅意所夺，日益萎靡。至宋明复又兴盛，回归《六经》，宗师孔、孟，重新挖掘儒家固有的义理心性之学，又吸收佛道思想为己所用，建立了一个冶儒、释、道于一炉，以心性义理为纲骨的理学体系。这样，儒学重新夺回了被佛教霸占长达八百多年的思想文化阵营的主导地位。据此，宋明阶段之儒学可称为“新儒学”或“新儒家”。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说：“唐代佛教称盛，而宋明道学家，即近所谓新儒家之学，亦萌芽于此。”^③钱穆说：“追寻之余孔孟六经，重振淑世之化，阴袭道院、禅林之绪余，而开新儒学之机运者，则所谓宋明理学是也。”^④可见，此“宋明新儒家”是相对于“先秦原始儒家”而言的。需要明确指出的是：此“新儒家”或“新儒学”绝非简单复归先秦儒家，而是对先秦儒学的继承与超越。

“新儒家”的第二层含义是指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一个学术思想

① 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96页。

② 《淮南子·要略》，选自《诸子集成》第7册，上海书店1994年版，第375页。

③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61年4月版，第800页。

④ 钱穆：《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93页。

流派，或称为“当代新儒家”（Neo-Confucianism）、“现代新儒家”，又有人称之为“文化保守主义”。^① 这一批人，“他们是把个人的生命安顿问题与‘家国天下’意识和接续‘斯文’、承担‘道统’的文化使命感联系在一起。”^② 颇为费解的是，从“现代新儒学”的概念能否成立，到如何对其进行界定与划分，海内外学术界仍在商榷之中。在这里，大陆现代新儒家研究的领军人物方克立先生的观点值得我们借鉴。1986年，方克立在《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一文中，第一次对现代新儒家进行了概念界定：“现代新儒家是在本世纪20年代产生的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以服膺宋明儒学为主要特征，力图用儒家学说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现代化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③ 1988年，在《关于现代新儒家研究的几个问题》一文中，方又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完善：“现代新儒家是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的，以续接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以服膺宋明理学（特别是儒家心性之学）为主要特征，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为本位，来吸纳、融合、会通西学，以寻求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化思潮。”^④ 这种观点代表了大陆学术界的主流看法，亦为笔者所赞同。需要明确的是，就本书而言，指称“宋明新儒学”或“宋明新儒家”，一律以“宋明理学”名之，“新儒学”或“新儒家”则明确是指“现当代新儒家”或“现当代新儒学”，文中所有涉及“新儒家”的说法，除特殊说明，亦是就此层面的意义而言。

（二）当代新儒家的分期

关于当代新儒家人物的界定以及分期问题，学术界也众说纷纭，难有定论。有学者在梁漱溟、冯友兰、钱穆等是否为“新儒家”成员问题上存在争议，有学者将“新儒家”发展划分为“三期”，又有学者持“四期”

① 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者”并不是说新儒家在文化上复古、在政治上退步，而是指其对传统文化有同情的理解，在对待西方文化上，他们仍然持开放的态度。可参阅郭齐勇：《现当代新儒家的反思》，系郭在东南大学发表的演讲。

② 郑家栋：《当代新儒学史论》，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③ 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页。

④ 同上书，第19页。

说，还有“三期四群”说，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方克立先生在《现代新儒家的发展历程》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标准，他主张根据现代新儒家的共同本质，从广义上来界定现代新儒家，他认为，当代新儒家不仅是中国文化本位论者，而且是儒学复兴论者、儒学现代化论者，即认为儒学在中国文化中居于主导和核心的地位，以继承、阐扬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哲学和人生智慧为职责，并通过吸纳、融合、会通西学来使它取得现代形态，以期在现在和将来的中国文化中继续保持主导地位。^① 根据这个标准，他将现代新儒家分为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0世纪20年代到1949年，代表人物是梁漱溟、张君勱、熊十力、冯友兰、贺麟等人。这一阶段新儒学主要是面对西方文化和激进主义的批判，在民族文化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积极为儒学争取生存的空间。第二阶段是从1949年到20世纪70年代末，代表人物是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方东美等人，在孤苦的困境中为延续儒学道统而奋斗不懈。第三阶段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到现在，代表人物主要有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蔡仁厚及台湾“鹅湖”系的部分成员。他们继承师业，视野开阔，思维活跃，积极进行中西文明的对话，使儒学逐渐走向国际舞台。^②

梁漱溟先生被公认为第一代新儒家的开山人物，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梁漱溟提出了他的三大文化路向说，他从“意欲”出发，将世界文化分为西、中、印三期，认为印度文化是向后去要求的文化，实不足取。西方文化是向前要求的，但暴露出了种种弊端。只有中国文化于现实最合理，可以去除西方社会的种种弊病。他甚至断言：“在世界未来文化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③ 在当时“批孔、批儒、反传统”一浪高过一浪的呼喊中，梁漱溟公开维护并提倡儒家的学说，实在功不可没。发生于1923年的“科玄论战”，在现代新儒家的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

① 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页。

② 2005年，在《致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的信》中，方克立进一步提出：“以甲申（2004）年7月贵阳阳明精舍儒学会讲（或谓‘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峰会’）为标志，它已进入了以蒋庆、康晓光、盛洪、陈明等人代表的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唱主角的阶段，或者说进入了整个现代新儒学运动的第四个阶段。”参见《原道》第12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③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22年版，第199页。

义。“科玄论战”主要是围绕“科学是否万能，能不能支配人生观”等问题进行的。站在玄学的立场上，张君勱先生向科学的功用和价值提出了怀疑和挑战，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几乎所有著名学者都被卷入其中的人生观大论战。熊十力先生是现代新儒家的又一杰出代表，他钻研“唯识学”而又复返儒家，承接宋明陆王心学，在重建中国儒学本体论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为新儒家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继承人，如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等人，以至于有学者将现代新儒家直接目为“熊十力的哲学流派”。^①冯友兰先生也是现代新儒家的重要人物。1927年，冯友兰先生发表了《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一文，文中的观点基本都反映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一书中。20世纪40年代，冯先生的《贞元六书》先后问世，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接着宋明理学讲”的新理学体系。此外，马一浮先生创办复兴书院，贺麟企图建立一种“新心学”的哲学体系，钱穆在史学领域亦对新儒家的发展功勋卓著。可以说，面对传统文化危机，第一代新儒家的大师们深入经典内部，重新挖掘儒家思想的精髓，为儒学争取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当代新儒家阵营中的梁漱溟、马一浮、贺麟、冯友兰等人留在了大陆，另外一些人如钱穆、张君勱、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方东美等人则“乘浮桴于海”，漂泊于港台及海外地区。在国内，儒学一度遭到了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打击，然幸甚至哉，儒学在海外保存了慧命并蓬勃发展。1949年，徐复观在香港创办《民主评论》，该杂志亦成为当代新儒家言论宣扬的重要文化堡垒；同时，钱穆等人则在港创办新亚书院，新亚书院成为海外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阵地以及现代新儒家传道授业的大本营。1951年，新儒家的另一重要文化阵地《人生》杂志创办。在台湾，牟宗三发起的“人文讲座”以及随后的“人文友会”为新儒家的发展聚拢了一大批人才；徐复观至台后亦致力于推进中国文化研究和新儒学运动，并组织了类似“师友讲习会”的活动。1962年，唐君毅、牟宗三等人 在香港发起成立了世界性的“东方人文学会”，致力于中国及东方文化的发展。不可否认，这些组织的成立及诸多的学术活动促

^① 余英时：《现代儒学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页。

进了新儒学在海外的的发展，影响日大。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58年元旦，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勱、唐君毅四位先生以“流亡海外，在四顾苍茫，一无凭藉的心境情调之下，抚今追昔，从根本上反复用心”之心态，在香港《民主评论》和台湾《再生》杂志联名同时发表了《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又名《中国文化与世界》）。此宣言在新儒家第二代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标志着第二代新儒家经过历史的巨大转折，抚今追昔，用心反思，重新贞定了自己的哲学和文化立场，而再度活跃于中国现代思想舞台上。同时它也反映了现代新儒家力图走向世界的努力和雄心”^①。就个人的学术活动而言，唐君毅先生从中西人文精神出发，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认为中国文化的返本开新就在于中西古今人文思想之会通；牟宗三先生发展了新儒家的“道德形上学”，一生致力于为人人类价值之标准与文化之方向而奋斗；徐复观先生以传统主义卫道，以自由主义论政，以其独特的文化观和历史观表现了对民族前途和文化的真挚关怀；方东美先生以弘扬中华文化的的精神价值为学术主旨，以开放的胸襟对待儒家、道家、西学，并力图贯穿古今、统摄诸家之学。一言以蔽之，第二代新儒家以花果飘零之心认真反省现代儒学遭受困境之原因，重新疏导中国文化的心性内涵、基本精神和生命历程，以儒学为最高判教标准容摄西方哲学，力图为中国文化及中华民族找到一条“返本开新”之道路。

方东美先生亦是第二代新儒家阵营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原因有二：其一，作为当代新儒家大师，方东美先生的学术重点在于论述中国、希腊、欧洲与印度四大传统，并认为世界文化的前途在于诸种文化多途并进和浑融互洽的演进。他吸纳中国古代的生命哲学思想，又糅合现代西方柏格森、怀特海哲学，乃至古代华严哲学，并以儒家的《易经》哲学贯通之，力主中国哲学与文化应回复先秦儒家道家健康饱满的生命精神。他的独特贡献，在于为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现代转折找到了一条全新的路径。其二，方东美不仅描绘出了以贯通希腊、欧洲与中国“哲学三慧”为基本特点的哲学体系，而且以自己的哲学生命滋养了成中英、刘述先等新儒家后学，

^① 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9页。

对现代新儒学的发展及承继产生了深远影响。毫无疑问，“方氏一门”，也即方东美先生及其两位高徒——成中英先生和刘述先先生的学术传承与哲学活动，可说达到了与熊、牟那一系相映成趣的地位。

二 “第三代新儒家”与成中英、杜维明、刘述先、蔡仁厚简介

20世纪80年代左右，现代新儒学的发展进入了第三个阶段。“第三代新儒家的崛起，不仅是由于师承相传的年龄的换代或接棒的需要，而且也是时代给予的发展机缘所造成的。”^①该时期新儒家学者所处的社会与文化氛围可与前辈截然不同。首先，中西文化在新时期下的交流与发展促进了第三代新儒家思想的形成，并赋予了其思想新的特点。在大陆地区，随着时代的进步，学术界开始尝试挣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对儒学和孔子进行了一系列重新认证。中国文化书院、中国孔子基金会的成立、祭孔大典的举行以及一系列学术会议的开展，极大地促进了儒学的发展、扩大了儒学的影响。政治气候的宽松、思想领域的健康，既促进了儒学在大陆的发展，也促使大陆学术界与港台、海外学者的交流进一步加强，许多新儒家学者的著作被介绍到国内，海内外学术界自由交流、互通有无。在国际上，东亚经济奇迹的出现为新儒家弘扬儒学提供了现实的佐证。同时，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信息交通的发达、各国交往的频繁使中西文化交流日益繁盛。这也促进了第三代新儒家开阔视野，开始关注全球化、多元文化、宗教运动、世界伦理等问题，并为其思想烙上了“文化交流与对话”的印记。此外，“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盛行也促使新儒家学者更多地思索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问题。后现代主义认为，西方社会凸显工具理性，片面追求科技与经济的进步，一方面使生态、能源、环境等问题加剧，一方面造成人与人之间更加功利化与世俗化，更加隔阂与疏离。新一代新儒家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与后现代主义有许多契合之处，可以救治理性社会的种种弊病。其次，西方社会对中国文化长期存在的漠视、误解与批判也促使新生代的儒家学者们奋起而作，努力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与中国文化在国

^① 方克立：《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62页。